

德国新医学® (GNM)

-----新医学的典范

© Caroline Markolin 博士，加拿大 温哥华

导言

1978年8月18日，医学博士 Ryke Geerd Hamer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肿瘤门诊担任主任医师时，接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儿子Dirk遭到了枪击。Dirk于1978年12月去世。几个月后，Hamer博士被诊断出睾丸癌。因为他此前从未生过大病，所以他立即猜测他的癌症可能与痛失爱子的惨剧直接相关。

Dirk的去世以及自身始患癌症促使Hamer博士着手调研他的癌症患者的个人病史。他很快了解到这些患者都像他一样，在患上癌症之前都曾经历过一些令人遭受异常压力打击的事件。将精神和身体结合所观察到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癌症和其他疾病常常发生在某些创伤性事件之后。但是Hamer博士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根据他的假定，所有身体活动都受大脑控制，他分析了其患者的脑部扫描，并与患者的病历记录进行比较。Hamer博士发现不仅仅是癌症，每种疾病均受到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的控制，并与一个非常独特且确定的“冲突打击”相关联。他的研究结果是一幅科学图解，展示了精神和大脑与整个人体器官和组织之间的生物学关系（英文版“GNM科学图解”见www.LearningGNM.com 网上书店）。

Hamer博士将其发现称作“新医学五大生物学定律”，因为这些生物学定律适用于任何患者，使我们对疾病的起因、形成以及自然康复过程有了全新的了解。（为了应对越来越多关于其发现的失实报道并保护其科学工作的完整性和真实性，Hamer博士的研究材料在德国新医学® (GNM) 名下依法受到保护。“新医学”这个词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版权）。

1981年，Hamer博士在蒂宾根大学医学系提交了他的发现，作为其博士后论文。尽管这所大学应遵循法律规定对Hamer博士的研究结果进行考查，但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拒绝考查。这种事件在大学历史上绝无仅有。同样，尽管有30多个独立医师和专业机构的科学证明，但官方医学机构也拒绝认可他的发现。

Hamer博士提交论文后不久，他接到最后通牒，要求他放弃继续研究，否则大学医疗部将不再与其续约。1986年，尽管他的科学研究从未受到过质疑，而且驳斥声甚少，但是由于他拒绝遵循标准医学原则，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尽管如此，他仍决定继续他的研究。到1987年时，他几乎将其发现扩展到医学界已知的每种疾病。

Hamer博士受到超过25年的迫害和烦扰，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当局。1997年以来，Hamer博士一直背井离乡，居住在西班牙，在那里他继续进行研究，继续为了他的“新医学”获得官方认可而斗争。但是只要蒂宾根大学医学系坚持拖延策略，全世界的患者就不能从Hamer博士革命性的发现中获益。

大脑中的疾病成因

Hamer博士确定“每种疾病都是由一个让身体完全丧失防卫的冲突打击所引起”（第一生物学定律）。出于对他儿子的敬意，Hamer博士将这种非预期应激事件称为 Dirk Hamer 综合症或DHS。从心理学来讲，DHS是一种由我们过去的经历、弱点、个人观点、价值观和信仰所决定的一起非常个人的事件。但是DHS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更是一种生理上的冲突，这一点只有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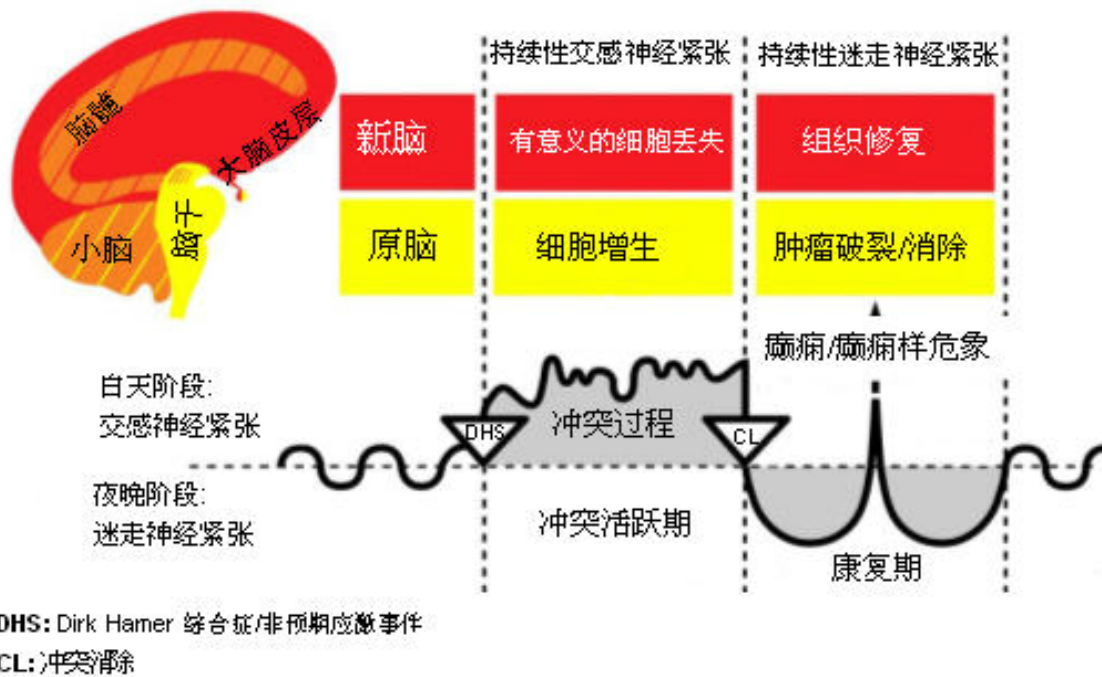
动物们经历的是真实而且具体的生理上的打击，例如，突然失去巢穴或领地，失去后代，与配偶或族群分离，意外的饥饿威胁，或者死亡的惊吓。随着时间的变化，人类的头脑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思维感觉经历类似这些生理上的冲突。例如，当一名男性意外失去家园或工作场所时经历的是“领土丧失冲突”；女性的“巢穴冲突”可能与担心某个“家庭成员”的健康有关；“离弃冲突”可能会由意外离婚或被匆忙送入医院所引发；孩子们常会在妈妈决定重新工作或双亲分开时遭受“分离冲突”。



通过分析数千份与患者病史相关的脑CT图像，Hamer博士发现DHS发生的同时，冲突会影响大脑中一个特定的预定区域，造成CT扫描图像上可见的“损伤”，表现为一组边缘清晰的靶状同心环（1989年，德国CT扫描仪制造商西门子公司认定这些环的形成不是设备造成的）。一旦经历打击，受影响的大脑细胞将冲突与相对应的器官沟通，之后用一种特定的、可预测的变化作为回应。之所以特定冲突与特定大脑区域紧密联系，是因为我们在进化历史中，大脑每一部分编码的程序都是为了即时回应可能威胁到生存的冲突。“原脑”（脑干和小脑）编码的程序主要负责基本的生存问题，与呼吸、进食或生育相关，“新脑”（大脑）则编码更高级的程序，诸如领地冲突、分离冲突、身份冲突、自我贬值冲突等。

Hamer博士的医学研究结果与胚胎学的发现紧密相连，因为不论器官对肿瘤生长、组织分解的冲突还是对功能性损伤的冲突作出响应，都由胚胎的胚层决定，而胚胎的胚层是器官和相应大脑组织发育的起源（第三生物学定律）。

德国新医学生物学示图



© Dr. med. Mag. theol. Ryke Geerd Hamer

GNM的“肿瘤发生系统”显示源自内胚层或“原脑”中胚层的“原脑”控制器官，例如肺、肝、结肠、前列腺、子宫、真皮层、胸膜、腹膜、心包膜、乳腺等，对应的冲突一旦发生，这些器官就会发生细胞增生。因此这些器官的肿瘤只在冲突活跃期（由DHS引发）形成。

以肺癌为例：与肺癌相关的生物学冲突为“死亡惊吓冲突”，因为在生物学术语中，死亡等同于不能呼吸。受到死亡惊吓打击时，调整呼吸的肺泡细胞瞬时开始分裂，形成肺肿瘤。与传统观点相反，肺部细胞的增殖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过程，而是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生物学目标，即增加肺容量从而提高生物体的生存机率。Hamer博士的脑部扫描分析证明每位肺癌患者在脑干的对应区域都有明显的靶状环形图像，每位患者在癌症发作之前都曾经历过意外的死亡惊吓。在绝大多数病例中，死亡惊吓是由癌症诊断打击所致，患者犹如经历了“死亡宣判”。鉴于吸烟正在减少，这重新阐明了肺癌（1号杀手）神秘增加的原因，同时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吸烟是否是导致肺癌的真正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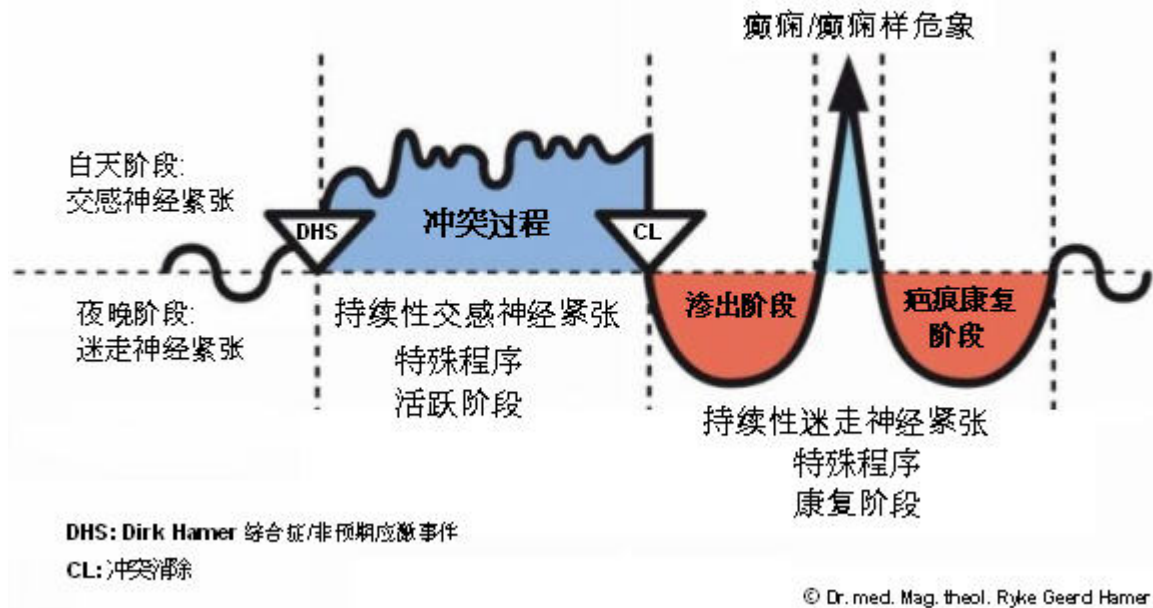
根据Hamer博士的发现，腺体性乳腺癌是“母亲子女”或“伴侣担忧”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这些冲突类型通常影响“原脑”中控制乳腺的区域。女性在子女突然受伤或病重时会经历母亲-子女担忧冲突。在冲突的活跃应激期，乳腺细胞不断分裂，形成肿瘤。细胞增殖的生物目的是为受苦的女儿提供更多乳汁从而加速其康复。人类女性和雌性哺乳动物天生具有古老的生物响应程序。Hamer博士的很多病例研究表明甚至不再哺乳的妇女都会因为过分担心所爱的人（遇到麻烦的孩子、生病的父母或所关心的朋友）的健康而发生乳腺肿瘤。

关于肺癌和乳腺癌所说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所有源自“原脑”的其他癌症。每种癌症都是由激活“有意义的特定生物程序”（第五生物学定律）的特定冲突打击所引发，这一过程令生物体能够超出日常机能并处理紧急情况。对于每种类型的冲突，都有一个大脑的特定生物程序进行协调。

“原脑”控制器官在冲突活跃期发生肿瘤生长，而大脑（“新脑”）控制的所有器官情况则相反。关于胚胎的胚层，所有大脑控制的器官和组织（卵巢、睾丸、骨骼、淋巴结、表皮、子宫颈内层、支气管、冠状血管、乳导管等）均发育自外胚层或“新脑”中胚层。冲突发生时，生物学对应的器官组织出现细胞变性。卵巢或睾丸坏死、骨质疏松、骨癌、胃溃疡等都仅仅是一个人在相关冲突发生时处于情绪应激状态时所发生的病症。可以预见的是，组织的缺失具有生物学意义。

以乳导管内层组织为例。由于乳导管的鳞状上皮内层发育形成比产生乳汁的腺体晚很多，这个较新的组织是由大脑中一个较新的部分来控制的，即大脑皮层。乳导管内层的生物学冲突是“分离冲突”，好像“我的孩子[或伴侣]从胸膛被撕裂开”一般。雌性哺乳动物在子女丢失或死去时会遭受同样的冲突。作为对冲突的自然反应，乳导管内层组织开始溃烂。组织缺失的目的是增加导管的直径，因为乳导管内径扩张后，不再有用的乳汁可以更加容易地排出而不会堵塞乳腺。每位妇女的脑部都有这样的生物反应程序。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女性乳腺是照顾和哺育的同义词，因此女性与其进行照顾的所深爱的人经历了这样一种意外的分离冲突。事实上，在冲突活跃期，除了乳腺偶尔有轻微的“牵拉”感觉，没有任何身体症状。

每种疾病具有两个阶段的模式



Hamer博士还发现，假设冲突可以分解，每种疾病分两阶段发展（第二生物学定律）。第一阶段为冲突活跃阶段，整个生物体都集中在处理冲突。当有生物学意义的细胞变性以生理水平进行时，心理和植物自主神经系统同样尝试处理意外情况。当转换到应激状态（交感神经紧张）时，精神完全被冲突内容所占据。典型的症状是睡眠紊乱、胃纳欠佳。该过程从生物学角度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将焦点集中在冲突上以及额外醒着的时间为克服冲突并找到冲突/矛盾解决答案提供了适当的条件。冲突活跃阶段也被称为“冷阶段”。这是由于血管在应激期间发生收缩，因此冲突活动的典型症状是身体末端发冷（特别是双手发冷）、颤抖、出冷汗。症状的强度自然取决于冲突的严重程度。

如果人长时间处于强烈的冲突活跃状态下，这种情况可能会致命。但是Hamer博士毋庸置疑地证明了生物体绝不会死于癌症本身。人可能由于肿瘤的机械性并发症死亡，例如结肠或胆管等重要器官出现梗阻，但是癌细胞不会造成死亡。在德国新医学中，“恶性”和“良性”肿瘤的区别完全没有意义。“恶性”这一术语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词汇（肿瘤标志物也是这样），用以简单说明细胞繁殖活动已经超过了某一限值。

如果人在冲突活跃阶段死亡，那么通常是因为能量丢失、体重下降、睡眠减少以及情绪和精神疲惫。常常是毁灭性的癌症诊断或者不良预后“你仅可以活六个月！”----将癌症患者（包括他们所爱的人）抛入绝境。这些患者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希望，他们被剥夺了生命力，日渐衰弱，并最终死于恶病质，常规的癌症治疗只会加速这一痛苦过程

如果患者没有接受任何常规治疗（特别是化疗或放疗），GNM的成功率为95%至9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Hamer博士的高成功率统计数据是由当局自己发布的。1997年，Hamer博士在没有医学执照的情况下为三位患者提供医学建议被逮捕时，警察没收了患者档案并对其进行分析。随后，一位公诉人不得不承认在试验期间，绝大多数患有“终末期”癌症的6500名患者在五年后仍有6000名存活。如果按常规治疗，这个数据一般是相反的。根据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Ulrich Abel博士（德国）的研究，“很多化疗的成功是令人震惊的糟糕.....没有科学依据证明化疗能够以任何可评估的方式延长最常见器官癌症患者的生命.....对太晚期而不适合手术的恶性肿瘤（占所有癌症的80%）的化疗仍是一片科学废墟。”（Lancet 1991）。

身体的自我康复

冲突在得到解决的同时会发出生物学程序第二阶段开始的信号。我们的情感和身体立即转入康复模式，同时植物神经系统转入“迷走神经紧张”加以辅助。在康复期间，患者的食欲好转，但是感觉非常疲惫（甚至可能起不了床）。由于身体正在尝试康复，休息并为身体提供营养十分重要。第二阶段也称为“暖阶段”，因为在“迷走神经紧张”时，血管扩张使得双手、双脚和皮肤都变暖。

冲突在得到解决同时，器官还立即产生一种瞬时的变化。细胞增殖（“原脑”控制的肿瘤生长）或细胞坏死（“新脑”控制的组织缺失）立即停止，并开始启动适当的修复过程。冲突活跃阶段坏死或溃烂的部位有新细胞重新填充。该过程通常可能将伴随疼痛性水肿，这是由身体康复时保护组织的水肿所致。其他典型的修复症状包括过敏、发痒、痉挛（如果涉及肌肉组织的话）以及炎症。只发生在康复阶段的“疾病”有：一些皮肤疾病、痔疮、喉炎、支气管炎、关节炎、动脉硬化、膀胱或肾脏疾病、某些肝脏疾病以及感染（见下方）。

根据对细胞繁殖（有丝分裂）的观察以及“良性”和“恶性”肿瘤之间的标准区别，传统医学解释自然愈合组织细胞生成为“恶性肿瘤”。同样地，虽然我们在GNM也区分两种类型的肿瘤，但是肿瘤并不分为“好的”和“坏的”；而是根据组织类型以及其起源并受控的脑部位置来进行分类。一些肿瘤（肺部肿瘤、结肠肿瘤、肝脏肿瘤、子宫肿瘤、前列腺肿瘤等）仅存在于冲突活跃阶段，相反地，有些肿瘤则仅存在于自然修复过程。对于“原脑”控制的癌症，肿瘤生长既不是意外，也不是没有意义，因为组织一开始修复时细胞增殖立即停止。睾丸癌、卵巢癌、淋巴瘤、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各种肉瘤、支气管癌和喉癌、子宫颈癌都具有康复性质且仅在愈合期出现。如果康复过程没有因药物治疗或冲突复发出现中断，则这些肿瘤在康复阶段结束时最终都会消除。

第二种类型的乳腺癌，“原位导管癌”（DCIS）也属于这一类。腺体性乳腺癌是女性处于担忧冲突活跃阶段的表征，导管内癌是相关分离冲突（“从胸膛撕裂开”）已经得以解决的阳性征兆。女性不会无缘无故地患上乳癌！也不会碰巧在右侧或左侧乳腺同时患上乳腺癌。

生理偏侧的意义

Hamer博士发现生理偏侧决定了一种疾病，例如癌症，是在身体右侧还是左侧发生。这个规则是：右利手者用身体左侧对他/她母亲或孩子之间的冲突作出响应，而用身体右侧对与“伴侣”（例如，父亲、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等）之间的冲突作出响应。对于左撇子，情况则相反。从大脑到身体存在交叉关系，因为大脑（不包括脑干）的每个半球指挥对侧的身体。

确定生物学偏侧的最简单方法是拍手试验。放在上方的手是起主导作用的手，表示我们是右利手还是左利手。因此，右侧乳腺癌、左侧卵巢囊肿、左侧或右侧（或两侧）皮肤疾病、左侧身体运动麻痹（例如中风后），给我们提供了冲突开始发生时“谁”牵涉其中的第一印象。关于更高级的冲突（和脑部区域），要进行准确的评估还需考虑激素的情况。

微生物的有益作用

Hamer博士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疾病发展过程中微生物所扮演的角色。简单来说，这是他所发现的（第四生物学定律）：真菌、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仅仅在康复阶段活跃，他们活动的方式与进化逻辑完全一致。譬如，结核杆菌仅在“原脑”控制的组织上聚集。他们在修复阶段的功能是分解目前过剩的肿瘤细胞，例如肺部肿瘤、结肠肿瘤、肾脏肿瘤、前列腺肿瘤、子宫瘤、乳腺肿瘤、黑色素瘤和间皮瘤等。结核杆菌对于破坏冲突活跃阶段由于生物原因增殖的“一次性细胞”的集结非常重要。如果因为接种疫苗、过度使用抗生素或化学治疗而使身体未能获得所需要的细菌，则肿瘤不能完全分解。结果就是肿瘤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并形成无害的囊肿。但是，这样的包囊生长经过常规检测会得出“癌症”的诊断，并可能由于新症状引起新的冲突打击。通过了解疾病发展的生物学定律，可以基本消除这种现象。

细菌能够分解身体不再需要的肿瘤细胞，而病毒似乎专门参与大脑皮层控制组织（例如：气管、鼻膜、胃内膜、胆管的内皮和表皮）的愈合过程。肝炎、肺炎、疱疹、流感和胃流感，都是“病毒性”自然愈合过程正在进行的征象。关于病毒的角色，Hamer博士偏向于讲“假设的病毒”，因为近来病毒是否存在令人质疑。这与Hamer博士的早期发现是一致的，即溃烂或坏死组织的重建和恢复过程即使在没有组织相关病毒存在时也会发生。

传统医学的困境在于不承认每种疾病都有双阶段模式，第一阶段的冲突活跃阶段通常都被忽视。由于微生物仅在康复阶段活跃，且微生物的活动一般伴有肿胀、发热、流脓、腹泻、疼痛等症状，因此微生物被认为对机体有害且是造成感染性疾病的原因。但是微生物不会引起疾病。毕竟是我们的机体应用微生物使愈合过程得以优化。当然，微生物能被传播，但它们会保持休眠状态，直至人体处于同类型冲突的康复阶段为止。

对肿瘤转移提出质疑

根据GNM的“肿瘤发生系统”，现在广泛宣传的转移理论，即表明癌细胞通过血液或淋巴管转移并引发新部位的癌症，用Hamer博士的话讲，这是“纯粹的学术捏造”。普通细胞和特殊的癌细胞在任何环境中都不会改变其组织结构或跨过胚胎层障碍。例如，一个肺癌细胞发育自内胚层，由脑干“原脑”控制，在冲突活跃阶段其细胞增殖不会转移到骨细胞中，后者源自中胚层，由大脑（“新脑”）控制，在冲突活跃脱钙过程中出现恶化。在“肺癌转移到骨骼”的情况中，肺癌细胞实际上要在身体的某些骨骼上挖一个洞（即细胞瓦解！一癌症的相反面）。我们同样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癌细胞很少“传播”到最近的相邻组织，例如，从子宫到子宫颈。如果癌细胞通过血流转移，为什么捐献的血液没有癌细胞扫描检测？为什么在癌症患者的血管壁内没有发现过各种肿瘤？

两年前，即2004年8月19日，加拿大报纸“环球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研究者追逐乳癌血液测试”的文章，其中这样的陈述很有启迪作用，“在血液循环系中寻找肿瘤细胞已经花费了10年的时间……”，“直至最近，仍然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可靠地从一小瓶人体血液中所含的数百万个红细胞和白细胞中提取到一个癌细胞。”除了“追逐”的事实远未结束之外（如文章所说），这难道没有暗示“转移”假设传达给了公众错误的信息，让数百万癌症患者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由于惊吓而死亡？

当然，Hamer博士并不怀疑第二癌症的事实，但是这些继发性肿瘤不是由于癌细胞不可思议地转移到其他细胞类型中所造成，而是因为新的冲突打击所致。新的DHSs可以由额外的创伤性经历或通过诊断打击所引发。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癌症的意外诊断，或者被告知正在“转移”，都会激发死亡惊吓（引发肺癌）或其他类型的诊断相关打击，从而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引发新的癌症。在很多病例中，患者没有机会进入康复阶段，因为在巨大压力之下，患者虚弱到几乎不可能在接受高毒的化学治疗后存活下来。

排在肺癌之后第二最常见的癌症是骨癌。Hamer博士发现我们的骨骼在生物学上与我们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相关。因此，如果一个人被告知患上“威胁生命的疾病”，特别是一种被描述为“像燎原之火一样传播”至全身的疾病，这就相当于：“现在没有任何用处”，紧跟着“无用”的感觉，骨骼开始脱钙（如果是乳癌，通常是胸骨或肋骨）。就像骨骼断裂一样，（“疾病”的）生物程序的目的是在康复阶段末期出现。修复阶段完成时，骨骼会更加强壮，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能更好地应对新的“自我贬值冲突”的可能性。

脑瘤的性质

一旦冲突得以解决，与精神和器官一起发生的脑部损伤也会进入康复阶段。与任何正在修复的损伤一样，脑部会形成水肿（额外的体液）来保护正在恢复的神经组织。在脑部扫描图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变化：边界清晰地的靶状环逐渐消失在水肿中，并出现模糊和发暗。

在康复阶段的高峰期，即脑部水肿最明显时，脑部出发一种短暂、强劲的推力将水肿排出。在GNM术语中，这种调节被称为“癫痫危象”（EC）。在这个发作期内，整个身体短暂地处于一种强烈交感神经紧张的状态中，即重新经历一次冲突活跃阶段的典型症状，例如出冷汗、手足发冷、心跳加速和恶心等。这种预定发作程序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之前所说的冲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心脏病发作、中风、哮喘发作、癫痫发作都是这个关键转折点的一些例子。发作的类型总是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和涉及到的确切脑部区域。

脑部水肿挤压出去之后，为神经元提供结构支持的脑部连接组织—神经胶质在水肿的位置聚集，来恢复受到冲突打击（DHS）影响的神经细胞的功能。神经胶质这种自然的聚集在常规医学中被贴上“脑瘤”的标签，并且通常会给患者造成很可怕的后果。Hamer博士在1981年已经认定“脑瘤”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康复阶段与器官（受修复阶段同步运行的相关脑部区域控制）同时工作的一种现象。因此，“转移性脑瘤”并不存在。

GNM治疗（概述）

GNM治疗的第一步是要了解症状的生物学属性，例如，某种癌症及其产生的精神因素。脑部扫描和对病史的充分了解对确定患者仍处于冲突活跃阶段或已经康复至关重要。如果仍处于活跃阶段，那么重点是确定最初的DHS，并找出解决冲突的策略。让患者对康复症状和可能的并发症有所准备至关重要。这些症状都是可以预知的！Hamer博士的发现在医学史上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体系，让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并且可以预知每种疾病的形成和症状。这是真正的预防性医学，对德国新医学的这方面永远强调不够。真正的预防需要理解疾病的真正起因，这正是Hamer博士的研究中阐述得极其详细的内容。通过理解疾病起因和康复过程的“五大生物学定律”，我们就不会对经常发生的症状感到恐惧和惊慌。这些知识不仅仅给予人们力量，还能够挽救生命。

作者简介



Caroline Markolin, 博士，德国新医学®的全职教师，经过Hamer博士的培训和认可。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和温哥华定期举办GNM周末研讨会。

如需更多关于GNM的信息，请访问<http://LearningGNM.com>。

本论文首次发表于：《探索!》杂志 2007年第16卷第2期